

## 欧洲极右翼政党为何偏爱职业教育

吴浩文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0)

**摘要:** 2008 年金融危机与 2022 年俄乌冲突之后, 欧洲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 深刻改变了欧盟及各成员国的政治生态。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无论执政的瑞士人民党、匈牙利青民盟, 还是在野的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 均表现出对职业教育的高度偏好, 同时对高等教育持批评态度。本文从阶级视角出发, 将极右翼的社会基础界定为对现状不满的大资产阶级、处于地位下滑焦虑中的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被动员的工人阶级, 进而从意识形态、选民基础与资产阶级利益三个层面, 解释其对职业教育的结构性偏好。在意识形态层面, 对职业教育的推崇与极右翼的民粹主义、主权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生产者主义及优绩主义高度相关; 职业教育中人文社科训练的先天薄弱, 亦使其成为传播右翼意识形态、挑战建制派文化霸权、巩固“再工业化”议题所有权的理想场域。在选民层面, 2008 年以来的贫富分化、去工业化与能源危机导致传统制造业地区持续衰落, 大量工人与小企业主成为激进右翼的潜在支持者; 他们大多依赖职业教育维持社会地位, 扩张职业教育因此具有精准的选举动员功能。在资产阶级利益层面, 面对竞争力持续下滑, 部分资产阶级对现行政策与建制派政党日益不满, 转向支持极右翼, 以扩大劳动力供给、压低工资成本, 并借助其意识形态转移工人的不满情绪; 在德国与法国, 极右翼正在努力获得大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瑞士与匈牙利, 大资产阶级更已构成执政党维系统治的关键支柱。本文综合运用政党政治中的需求—供给理论与议题所有权理论, 结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比较德国、法国、瑞士、匈牙利四国激进右翼政党的教育政策, 探究其偏好职业教育的结构性动因, 并对其政治影响作出初步判断。

**关键词:** 极右翼、职业教育、阶级分析、需求-供给理论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 一、为什么要研究极右翼的职业教育偏好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普遍崛起并且取得了进展。2026 年 8 月 16 日根据新华社报道, 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 (AFD) 的支持率在 8 月 10 日到 8 月 14 日的民调中达到了 28%, 是支持率最高的政党。而根据最新民调, 法国国民联盟 (RN) 的 2027 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也以 35% 的优势领跑。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对欧洲政坛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如果我们观察 AFD 和 RN 的纲领, 乃至早在 1999 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的瑞士人民党 (SVP) 还有在 2010 年执政于 2026 年下台的匈牙利青民盟。其执政纲领中却都强调了要支持职业教育。在德国 AFD 的 2025 年联邦议院选举纲领中, 明确支持加强职业教育。法国国民联盟也在其总纲领中强调了“要恢复职业教育的崇高地位”并对实行学徒制的企业进行补贴。而且他们也都表现出了对于现行高等教育的不满。我们可以由此发现, 极右翼关于职业教育的普遍支持可以作为研究极右翼共同特征和核心特征的重要角度, 其对于职业教育的偏爱在极右翼普遍崛起的背景下也很可能影响欧洲目前和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格局。本文章将以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瑞士人民党、匈牙利青年民主联盟作为欧洲极右翼的代表样本, 分别是在野的极右翼政党、在西欧的极右翼执政党、中东欧的极右翼执政党的代表。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欧洲极右翼政党为何普遍偏好加强发展职业教育, 学界对于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层面, 分别是选民基础、意识形态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在选民基础层面 Hooghe, Marks 和 Kamphor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4) 基于 15 个欧洲国家数据的跨国研究发现教育领域（而非仅仅是教育水平）对预测 GAL（绿党/自由派）和 TAN（威权/民族主义）政党投票具有稳健显著且实质性强烈的影响。GAL 选民多为大学毕业生，TAN 选民多为仅接受中等教育者。比如 2016 年剑桥 Arzheimer 的研究指出大学教育程度者最不可能投票给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RR）政党，而低教育水平公民在 PRR 选民中比例过高。2024 年皮尤研究中心 2024 年 1-3 月对 1008 名德国成年人的调查表明教育水平较低的德国人比教育水平较高者对 AfD 持正面看法的比例高出 10 个百分点（22% vs. 12%）。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李俊更是强调极右翼利用了教育带来的分隔情绪。

在意识形态层面，极右翼民粹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是“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的对立。这种对学术精英和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不信任，使其天然倾向于扩张职业教育（VET）同时限制高等教育（HE）。Kurer, T., 和 Wewer, G. (2023) 在一项发表于 West European Politics 的研究中系统论证了这一点。极右翼也将教育政策视为推行其核心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职业教育是其实现“文化斗争”的抓手。Giudici, A., et al. (Eds.) (2025) 系统论证了极右翼如何将教育主要视为传播保守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手段。《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2025 年特刊系统研究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教育政策，是回答此问题的核心学术文献。其中指出，教育已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战场，其立场根植于反主流（anti-mainstream）、本土主义（nativism）和绩效主义（merit）等核心理念。

而在经济利益上 Szarka (2023) 分析了 183 篇媒体报道，发现经济叙事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受训者被描述为“可以多种方式使用的资源”，而从未被称作“学生”。研究指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在将培训置于经济部门之下，用资本主义逻辑决定需要什么劳动力。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整体缺乏对于相关问题的专门研究，尤其是缺乏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角度的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确实足以证明教育和对极右翼投票偏好的关系，以及极右翼意识形态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 二、极右翼的阶级基础与分析方法

目前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和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有着诸多不同，在政治——社会功能上的生态位，与上个世纪 20—30 年代的法西斯政党非常相似。比如历史学家恩佐·特拉韦索就提出了后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强调“当代极右翼放弃了旧的法西斯主义但也没有完全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赵丁琪在《“后政治”视域下的右翼民粹主义与历史的“空位期”》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不存在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资本主义危机深化背景下可能向法西斯主义转化。我们也可以以此推断，当代欧洲极右翼政党和曾经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具有类似的阶级基础，即对于当前情况感到焦虑的小资产阶级、部分被动员的无产阶级。还有作为潜在最大支持者的大资产阶级。

而从其支持者阶级构成也能从侧面证实这一点。2025 年联邦议院 2025 年选举后的民调显示 AfD 在工人中的得票率高达 38% 远超联盟党（22%）和社民党（12%），而在联邦层面根据德国电视一台的数据大概有 21% 的自雇佣者支持 AfD。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53% 的体力

劳动者、40%的蓝领投票给了国民联盟，而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有51%的“手工业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投票给了玛丽·勒庞。瑞士人民党中有71%的农业劳动者、39%的建筑业人员46%的交通运输业。瑞士联邦统计局指出SVP的核心选民是工人和工商业从业者。这些数据证明了部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于极右翼政党的支持。

而在大资产阶级层面。2025年11月德国国家企业协会已经解除了对AFD的“政治隔离”，2025年AfD收到超500万欧元捐款，95%的大额捐赠来自仅三名捐赠者。

France24深度报道，详述RN与法国商界精英的密切往来。亿万富翁Vincent Bolloré的媒体帝国为RN提供支持。科技亿万富翁Pierre-Édouard Stérin为RN提供经济顾问。玛丽勒庞与LVMH主席Bernard Arnault、TotalEnergies CEO等法国顶级商界领袖共进晚餐。RN主席巴尔德拉与法国最大雇主联合会Medef执行委员会共进午餐。瑞士的SVP重要党首克里斯托弗·布洛赫本人更是一名亿万富豪。其2017年竞选文件更是自称SVP希望作为最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匈牙利青民盟政府本身就创造了很多依附于政权的资产阶级。青民盟通过“国家合作体系”（NER）打造忠诚于政权的寡头阶层。13名青民盟关联寡头在2011至2023年间通过欧盟资金支持的公共采购获得总计193亿欧元合同。约300至400家国企被分配给青民盟盟友。核心寡头包括总理童年好友和女婿。

所以本文除了讨论极右翼偏爱职业教育的意识形态需求，也会基于极右翼的阶级基础进行单独分析。

### 三、极右翼偏好职业教育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分析当前的欧洲极右翼，或者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在学界并没有定论，但是我们可以以目前欧洲议会中极右翼党团（比如ECR欧洲保守派与改革主义者联盟，Pfe欧洲爱国者、ESN主权国家欧洲）的纲领还有其核心组成的纲领，我们大致能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比如三大党团在政治上强调主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文化上强调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和进步主义文化持排斥态度。在经济上普遍强调去干预、重视制造业。下文将基于这些讨论极右翼偏好职业教育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欧洲主要国家的极右翼普遍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其叙事强调国家主权遭到了欧盟或者其他“国际主义力量”的威胁。同时极右翼也强调维护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也认为这种文化受到了所谓左翼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在极右翼的视角中，大学被普遍视为左翼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传播阵地。根据《匈牙利今日报》的报道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主任欧尔班·巴拉兹在2025年9月MCC开学典礼的讲话称许多西方大学已成为“自由派、进步教条的信徒”。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纲领里也明确认为大学存在左翼灌输。法国国民联盟2022年的总统纲领也认为高等教师教育学院“助长有害意识形态传播”。2026年瑞士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托马斯·埃希称大学“滥用自己的公信力进行左翼激进的情绪煽动”。

相比之下，欧洲职业教育的人文社科教育相对薄弱，便于极右翼将其作为争夺文化霸权的战场。2024年欧洲理事会承认，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公民素养在职业教育中获得的关注往往有限。NERDVET项目报告（欧盟Erasmus+资助）：指出职业教育课程常偏重技术科目而忽视人文学科；批判性思维教学缺乏系统性，且相关优秀实践大多属于高等教育范畴。而广泛的研究也证明了学历较低者更有可能投票给极右翼政党。

卢索福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与发展跨学科研究中心（CeIED）主任。

而推广职业教育本身也与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契合。António Teodoro 在《当羞耻感消失：新欧洲右翼实验室中的教育》中指出了通过重新制定课程、重新定义教育优先事项或质疑某些知识，教育政策有助于巩固新的文化规范。以前被认为不可接受的事物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首先，目前欧洲极右翼基本属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民粹主义既平民主义，根据荷兰政治学家卡斯穆德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薄中心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它将社会从根本上分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两个同质且对立的阵营，并认为政治应表达人民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而在目前欧洲极右翼的话语体系中，普遍勾勒的“腐败精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主等依据物质财富划分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左翼语境下的资产阶级。而是更多基于文化地位的知识精英，比如充满所谓觉醒文化意识形态的精英政客，或者相关的学者、媒体机构、作家。这种话语实际上是极右翼利用无产阶级对于现状的不满，将阶级矛盾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转移到为现有统治集团的具体政客和为其服务的文化等上层建筑。而这些“腐败精英”的产生和发展与高等教育高度相关，大学也被极右翼视为阵地，因此倾向职业教育，削弱高等教育本身也是加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决”

其次，目前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名为生产者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将社会分为“创造财富的生产者”与“寄生精英”的意识形态。它认为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成员（如工人、农民、小企业主）对社会贡献更大，而那些靠遗产、投机或福利获利者（如贵族、金融家）则是掠夺者。而支持职业教育，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来讲，被极右翼视为培养社会栋梁的途径，有利于回应以蓝领和小企业主为代表的选民的焦虑和不满，塑造了自身更加重视“真正创造财富的人”，反对所谓不事生产的“腐败的左翼精英”，同时也契合了极右翼强调的制造业复兴与国家复兴的叙事。

最后，支持职业教育也符合极右翼普遍倡导的优绩主义，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旨在通过竞争选拔“精英”，并塑造了一个“赢家通吃”的逻辑。比如德国选择党和法国的国民联盟的纲领都明确认为，今天德法的教育体系缺乏筛选效用，导致了大量的资质平庸的学生成为了硕士而不是成为社会急需的技术工人。瑞士人民党官方立场文件《Leistung fordern - Leistung fördern》（2006 年 1 月）明确主张教育须以就业为导向、聚焦实践；将高中学历膨胀归咎于“向下拉平”；反对应用科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在 2024 年瑞士人民党议员也提案要求对高中毕业率超过 20% 的州进行大学入学考试，2026 年也有瑞士人民党议员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先完成职业教育才能上大学，认为这能让学生更目标明确、实践能力更强。其纲领也明确特意强调了很多岗位如助产士护士幼师不需要高等教育学位。这些都证明侧重职业教育符合其优绩主义的偏好。

### 三、欧洲极右翼偏好职业教育的选民基础

讨论极右翼政党为何偏好职业教育，则必然讨论其选民，也就是极右翼政党的中下层阶级基础。前文已经讨论过，产业工人和小企业主对于极右翼来说十分重要。因而本节的重点是引用政党的需求和供给的理论去讨论为何部分普遍接受职业教育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以小企业主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从传统政党，其次是何加强职业教育能够动员他们。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为何的欧洲的部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何倒向了极右翼。自 1989 年东欧剧变到 1993 年欧盟成立以来，欧洲的资产阶级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包括东

西欧的欧洲统一市场，并且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的成功，欧盟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扩展，在欧洲内部地区不平衡加剧，欧盟的传统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 2011 年欧债危机后，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反欧盟和反建制力量崛起，欧盟经济增长放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 GDP 占全球的比例从 21.1%降至 17.3%。制造业 GDP 从 17.34%降至 13.83%

比如在欧债危机后，德国出现了以反欧元学术团体为基础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和梅朗雄的不屈法国支持率不断增长，东欧的社民党普遍消退，代表是匈牙利社会党的持续衰落和欧尔班在 2010 成为匈牙利总理。而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于经济制裁导致的能源危机，欧洲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遭受了极大冲击。

在冲击的对象来说，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受到的冲击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于全球化的不满、对于生活的焦虑普遍影响了这些蓝领的倾向。比如在德国，位于产业链中下游的前东德地区最早抛弃了传统政治力量，1990 年西德主流政党（基民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在东德的支持率从 1990 年统一时的 86.1%降到 40%。而法国在 1970 年至 2014 年间法国工业总共失去了 230 万个工作岗位，尤其以洛林、敦刻尔克、北加来海峡等传统工业区受到冲击严重，大量的去工业化导致了普遍的被抛弃感。而东欧、南欧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经济遭到严重打击，人才严重外流。普遍表现出了对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诉求，对于紧缩政策，难民政策的不满。对于现存政治格局的不满。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大量不满，这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来自社会和选民的政党需求。而极右翼政党利用民粹主义、主权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生产者主义的话语，还有对于觉醒文化等文化符号的攻击。成功动员了工人选民。并且同时其他政党尤其是传统意义上把工人作为基本盘的左翼政党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政党供给来回应这种强烈的需求。首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洲的左翼政党普遍中间化，和中右翼政党的政治纲领趋同。法国社会党在 1983 年密特朗经济转向时期的就大幅右转，严重损害了其和工会的关系，在 2012—2017 年的社会党奥朗德政府更是在劳动法改革上几乎采取了放弃工人阶级的路线。德国社民党在施罗德时期进行的哈茨改革严重撕裂了社民党和工人的关系，导致了党内左翼的拉方丹派系分离，和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合并成为了左翼党（die linke）。东欧的社民党更是为了融入欧盟大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性质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左翼政党根本没有成功回应工人的诉求，或者是正是欧洲左翼政党的政党供给和工人政党需求的错位导致了极右翼得以成功动员工人。

总而言之，极右翼通过文化叙事和各种方法回应了蓝领工人的诉求，成功动员了蓝领工人阶级。增加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动员蓝领工人，本身也可以扩大作为选举基本盘的工人阶级的数量

而关于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将其定义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并且说明了这个阶级的性质“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其中的小企业主、小商人。

而在 2011 年欧债危机、2015 年和 2022 年俄乌危机后，小企业主和农民、小商人这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群体相比于大型企业更容易受到冲击，对于现状也更加不满，而对于自身阶级滑落的焦虑容易迫使他们寻求尽快改变现存对他们不利的政策，比如在欧盟框架内对德国的转移支付，还有外交上对俄制裁带来的能源成本上升，对于欧盟法规带来的成本的不满。危机越强烈，这个阶级内的焦虑就越高。这导致了传统政党不愿意供给的政党需求，于是极右翼政党通过相关的政党供给成功的动员了他们。

极右翼政党为何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动员大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首先在德国、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工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高度依附于制造业。

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其动员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话语主要可以分为两点，分别是推动再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复兴。以及反对觉醒文化等所谓“自由主义、左翼、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维护民族文化和国家主权。

而工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普遍都与制造业相关，而且他们普遍接受职业教育，这方面，产业工人自不必说，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更多的面临竞争，接受职业教育在意识形态上更容易认同极右翼的产业工人明显可以增加选票。而德法瑞士等欧洲国家的小企业主普遍和职业教育、制造业高度相关。在瑞士，雇员不超过 50 人的小企业雇佣了约 47.5% 的劳动力，而在职业教育方面作用更为关键——70% 的学徒是在此类小企业中接受培训的。学徒从第一年起就参与生产，从企业视角看，培训成本大部分被学徒生产性劳动的收益所覆盖，因此培训学徒对企业而言在经济上是划算的。SFUVET 2025 年报告显示，超过 70% 的学徒岗位在培训期间为培训企业带来了正的净收益。BIBB（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数据显示，德国二元制体系中一半以上的青年学徒在雇员少于 50 人的小型企业接受培训。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经济的支柱，二元制培训是其人才供给的基础。对于以制造业相关的小企业主等小资产阶级来说，发展职业教育本身也有助于提供更多劳动力，维护其经济利益。

从叙事的角度看，大力投资职业教育也是加强极右翼政党复兴制造业叙事，宣传加强职业教育促进再工业化，可以回应工人和小企业主因为制造业衰退产生的政党需求。而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推广职业教育，反对目前的学术化和高等教育本身就是推动反对自由派和左翼的意识形态行动的一部分，也可以加强“代表人民的极右翼”支持“真正创造财富的人”对抗“腐败精英集中的左翼的大学”的叙事，也有助于动员那些将经济问题归因于觉醒文化的蓝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

#### 四、极右翼偏爱职业教育的统治阶级因素

毫无疑问，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右翼政党，代表着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框架下的资产阶级政党，必然只能代表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极右翼政党对于职业教育的偏爱，也必然和其支持极右翼的资产阶级立场相关。主要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下文将以三个长期执政且对本国产生影响的极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匈牙利青民盟和意大利兄弟党作为案例

首先，从经济基础上，极右翼偏爱职业教育和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叠和前文论证的动员小资产阶级的的方法基本一致。既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这既可以动员具体的小企业主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从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和政策也能看到这些观点。尤其是对于瑞士、匈牙利等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国家，强大的中小企业也能很快促进大企业获得更多利润。所以我们也能发现在瑞士和匈牙利，这种表现最为强烈甚至能从其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系上看出。

比如瑞士人民党，其纲领中认为 SVP 支持高质量的教育，其重点应放在职业世界的经济现实上”。文件还明确指出“SVP 拒绝职业教育基金”，主张“对培训学徒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

读者来信则指出职业教育基金“尤其有利于拥有大量学徒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乐于将学徒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而瑞士人民党在资金和人事上也能发现和资产阶级尤其是需要职业资产阶级联系很深

据瑞士媒体报道，瑞士人民党重要人物克里斯托弗布洛赫之女 Martullo-Blocher 自 2015 年起担任格劳宾登州国民院议员，其领导的 EMS 化学公司是格劳宾登州最大的学徒培训企业，在瑞士雇佣约 1000 名员工，培训约 150 名本企业学徒及约 130 名第三方企业学徒。

而且在政治行动上，瑞士人民党也切实为此进行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也体现了其主张为何符合资产阶级立场

SVP 籍联邦委员兼经济与教育部长居伊·帕姆兰（Guy Parmelin）主导了提升高级职业教育的改革。2024 年 3 月，国民议会以 154 票赞成、33 票反对、3 票弃权通过了引入“Professional Bachelor”和“Professional Master”头衔的动议。

Sandra Sollberger 动议（23.4078 号）要求联邦委员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减轻培训企业的财务与行政负担，包括税收减免和行政简化。动议由 40 名议员联署。2024 年 6 月 13 日，国民议会以 127 票赞成、63 票反对、5 票弃权通过。反对票主要来自 SP 和绿党。

2023 年 9 月，SVP 籍国民院议员 Sandra Sollberger 提交动议，要求联邦委员会采取税收减免等措施减轻培训企业的财务与行政负担。2024 年 6 月 13 日，国民议会以 127 票赞成、63 票反对、5 票弃权通过。Sollberger 在议会辩论中强调：“职业教育应更具吸引力。我们需要更多手工艺人、更多实践者”。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极右翼政党执政政权是匈牙利的青民盟政府，与瑞士和意大利等国的极右翼政权不同，由于各种原因青民盟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选举体制并且借此长期掌握政权，而且和许多商业力量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裙带资本主义式荫庇关系。这种政权与资产阶级的紧密联系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依赖制造业的经济基础相结合，使其明显地将倾斜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一环。

首先式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除了前文已经论述的欧尔班政权依靠权力关系主动制造了一批资产阶级外，匈牙利的很多资产阶级也以各种方式支持欧尔班政权，并且帮助欧尔班政权在资金上取得了优势。

据 24.hu 调查报道，Mészáros Lőrinc 旗下的 V-Híd Zrt. 向与青民盟竞选活动关联的“数字民主发展基金会”（Digitális Demokráciafejlesztési Alapítvány）注资 18 亿福林（约合 470 万欧元）。

关于 V-Híd Zrt. 的收入来源，反腐败研究机构的分析显示，与青民盟关联的寡头企业网络在欧盟资金资助的公共采购中占据主导地位。匈牙利腐败研究中心（CRCB）的分析指出，13 名与青民盟关联的商人及其公司获得了约 13% - 21% 的欧盟资助公共采购支出。

据 Republikon 研究所的分析，2022 年全国选举中，青民盟竞选支出约为 100 亿福林（2500 万欧元），而所有反对党合计支出仅约 30 亿福林（760 万欧元）。

而在具体的政策上，为了促进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匈牙利青民盟政府推动了大量政策，来扶持职业教育。欧尔班曾在讲话中强调“没有工作和职业技能就没有未来”，并表示政府已与匈牙利工商会（MKIK）合作创新职业教育。匈牙利政府官网（kormany.hu）也报道了此次讲话。

2010 年，青民盟将职业教育主管权从教育部转移至国家经济部，标志着职业教育从“教育逻辑”转向“经济逻辑”。

2015 年，政府发布该发展概念，明确将职业教育定位为服务经济的工具。部分培训学制缩短，义务教育年龄从 18 岁降至 16 岁，基础教育课时被压缩。同年以制度化形式引入双元制，学生同时在职业学校和企业接受培训。

《职业教育与培训法》（VET Act LXXX of 2019）2019 年 11 月由国会通过，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基于 VET 4.0 战略，系统性地重塑了匈牙利职业教育体系。法律规定国家提供最多两个职业资格的免费培训。该法建立了新的国家职教与成人学习办公室（NOVETAL）和 IKK 创新培训支持中心

而且在这些政策中，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15 年约 8,000 家企业参与了职教。这些政策也取得了巨大的效果——2022 年秋季职教学生达 32.5 万人。超过 200,000 名中学学生（约三分之二）接受职业教育。为匈牙利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匈牙利相关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Szarka（2023）的研究指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

现在将职业教育培训置于经济部门之下，用资本主义逻辑决定需要何种劳动力。

在 2022 年上台的意大利兄弟党政权，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政府向职业教育大量倾斜。2025 年 2 月 4 日，意大利兄弟党的总理梅洛尼在“全国 STEM 周”致辞中，将技术职业教育改革列为政府核心行动之一。并且其动机也同样遭到了广泛质疑。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批评“4+2 改革大幅减少了教学时数，特别是在科学学科和语言方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廉价和不稳定劳动（lavoro povero e precario）进行竞争”。

ARCI（意大利最大的社会促进组织之一）指出，学校-工作交替（ASL）“从教学工具变成了零成本劳动力供应（un’ offerta di manodopera a costo zero）”。

而且即使从相关学生的实习待遇，也能发现其培养廉价劳动力的本质

《共和报》报道，2025 年前两个月，学生和学徒的事故报告增加了 5%，已有 5 人死亡。超过 60% 的实习在意大利仍无薪或仅提供低于 300 欧元的象征性报销。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得出结论，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倾斜职业教育有助于帮助资产阶级培养大量廉价劳动力促进其国际竞争，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普遍推广的职业教育也能满足其上层建筑层面的需求。

教育本身对于阶级关系就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葛兰西都对于相关的问题做出了深刻的研究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里写道：“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学校是生产意识形态的‘工厂’和培养知识分子的‘工具’，同时也是衡量国家文化统治实力的标准”

而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推广职业教育是规训无产阶级和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意大利教育部长朱塞佩·瓦尔迪塔拉（Giuseppe Valditara）声称学校一直在学生中传播“觉醒”（wokeness）文化，却未能让学生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他主张用“严厉的爱”来挑选人才，通过严格纪律“塑造学生性格”。

而意大利兄弟党推动的“意大利制造高中”计划，将高中年限从 5 年缩短至 4 年，技术学院越来越侧重体力劳动，将职业教育与保护国家品牌和文化认同直接挂钩。

在前文讨论过的匈牙利资产阶级，也非常重视将职业教育视为夺取和维持极右翼文化霸权的空间。

瑞士人民党也把以职业教育为代表的所谓实践教育和所谓意识形态教育高等教育对立，主张学校应聚焦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放弃“意识形态化的性别与性教育课程以及敌视经济的生态和消费者保护课程”该党将公立学校视为左翼意识形态的传播阵地，明确要求终结“觉醒”（woke）学校，清除“性别议题”和“围绕 LGBTQ+ 主题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被指持续攻击瑞典的民众教育传统，主张削减对民众高中和自由成人教育的资助，认为这些机构受左翼影响过深，转而将资源导向更可控的职业培训领域。

这些案例也说明了当代极右翼政党倾斜职业教育本身也是其塑造文化霸权，规训无产阶级，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

## 五、 结论

极右翼偏爱职业教育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可动员工人阶级、小资

产阶级、符合资产阶级利益。

从意识形态来说，大量扶持职业教育符合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民粹主义、生产者主义、优绩主义、主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职业教育机构本身也是极右翼进行文化战争、选举动员、争夺文化霸权的重要场所。

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推广职业教育也是其扩大选举基本盘、动员。大量的工人阶级由于对现状不满，逐渐抛弃了无法回应他们政党需求的中间派和左翼政党，只有极右翼通过文化战争和工业复苏成功动员了蓝领工人，他们普遍倾向于极右翼政党。加强职业教育本身就有助于加强工业复兴叙事进一步动员蓝领工人，而且职业教育的加强本身也有助于扩大这一选举基本盘。

欧洲极右翼政党偏爱职业教育也符合他们的阶级立场即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职业教育培养的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以及削弱工人的议价权。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大量的职业教育机构也有助于极右翼传播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转移阶级矛盾。

欧洲极右翼偏爱职业教育的原因深植于极右翼的结构性根源和阶级基础，而这种阶级基础带来的政策偏向本身会带来深远影响。极右翼对于职业教育的偏爱很可能会加剧文化战争，以及加强现有的偏好制造业的政策倾向。但是从欧尔班在 2026 年选举中失败下台中我们也能发现，如果缺乏实际能力满足受众需求，那么这种动员和吸引力可能会消失。

#### 参考文献 1

- [1] 李俊. “德国右翼政党崛起：难民只是催化剂，教育制度加剧了社会分隔。”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2017 年 2 月。
- [2] 赵丁琪. “后政治视域下的右翼民粹主义与历史的‘空位期’.”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3 年第 04 期。
- [3] ZORA (University of Zurich). (2020). FOKUS Aargau: Bericht Grossratswahl 2020. <https://www.zora.uzh.ch/>
- [4] Telex. (2025, July 3). EU taxpayers may have supported 13 leading oligarchs of Orbán regime with up to EUR 5.5 billion.
- [5] (2017). In addition to the curbing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 Corvinu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8(2). [https://cjssp.uni-corvinus.hu/\[reference:17\]](https://cjssp.uni-corvinus.hu/[reference:17])
- [6] Rogers, S. (202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arian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pitalists without the Right Kind of Capital. Routledge. [https://www.routledge.com/\[reference:19\]](https://www.routledge.com/[reference:19])
- [7] Orbán, V., Kickl, H., & Babiš, A. (2024, June 30). A patriotic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future. Patriots for Europe.
- [8] 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Party. (2024, April 24). ECR Party adopts manifesto for European elections, decides not to put forward a lead candidate.
- [9] 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 Party. (2024). Political program. Retrieved August 26, 2026, from
- [10] 王建华《教育优绩主义及其超越》：《高等教育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46-56 页
- [11] 杨解朴. 《德国在欧盟角色的演变：从科尔到默克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 [12] Artus, Patrick, and Marie-Paule Virard. La France sans ses usines. Fayard, 2011.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 [14] Bäumeler, C., and N. Lamamra. “Small Firms: Motivations in Offering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in Switzerland.” Swiss Federal Universit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FUVET), 2025.

[15] Swiss Federal Universit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FUVET). “Company Perspectives on Costs, Benefits and Training Quality 2025.” SFUVET, 2025.

[16] Fede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IBB). 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in Germany. BIBB, 2020.

[17] Swiss People's Party (SVP). “Bildung,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VP Schweiz, [www.svp.ch/positionen/themen/bildungspolitik/](http://www.svp.ch/positionen/themen/bildungspolitik/). Accessed 8 Sept. 2026.

[18] Hagmann, Yannick. “Berufsbildungsfond ist unfair gegen ü ber Kleinbetrieben” [Vocational Training Fund Is Unfair to Small Businesses]. Urner Zeitung, 11 Aug. 2026, [www.urnerzeitung.ch/meinung/leserbriefe-lz/artikel-ld.4215175](http://www.urnerzeitung.ch/meinung/leserbriefe-lz/artikel-ld.4215175).

[20] SVP fordert: Lehre vor Studium als neuer Standard” [SVP Demands: Apprenticeship Before Studies as New Standard]. 20 Minuten, 11 July 2026.

[21] Sollberger, Sandra. Motion 23.4078: Lehrbetriebe entlasten [Motion 23.4078: Relieve Training Companies]. Swiss Federal Parliament, Sept. 2023. *Ann é e Politique Suisse*, [anneepolitique.swiss/references/708512](http://anneepolitique.swiss/references/708512).

[22] 24.hu: 1,8 milli á rddal t á mogatta a V-H í d a Fideszhez kötött alap í tv á nyt” [24.hu: V-H í d Supported a Fidesz-Linked Foundation with 1.8 Billion]. Startlap, 30 Apr. 2026, [www.startlap.hu/valasztas/24-hu-18-milliarddal-tamogatta-a-v-hid-a-fideszhez-kotott-alapitvanyt/](http://www.startlap.hu/valasztas/24-hu-18-milliarddal-tamogatta-a-v-hid-a-fideszhez-kotott-alapitvanyt/).

[23] Kosa, Kitti, and Republikon Institute. “Disparity in Campaign Financing in Hungary’ s 2024 EP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 4liberty.eu, 20 Sept. 2024, [4liberty.eu/disparity-in-campaign-financing-in-hungarys-2024-ep-and-municipal-elections/](http://4liberty.eu/disparity-in-campaign-financing-in-hungarys-2024-ep-and-municipal-elections/).

[24] Szarka, Alexandra. “How Did Vocational Students Become an Economic Interest?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Hungarian VET.” *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vol. 21, no. 1, Apr. 2023, pp. 59-93. ERIC, EJ1393559.

[25] 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M]//列宁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3-284.

[26]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18.

## Why European Far-Right Parties Favor Vocational Education

Wu Haowen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0)

**Abstract:**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22 Russia-Ukraine conflict, European far-right parties rose rapidly,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One noteworthy phenomenon is that whether governing parties such as the Swiss People's Party and Hungary's Fidesz, or opposition parties such as Germany's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nd France's National Rally, all demonstrate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le adopting a critical stance toward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clas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ocial base of the far right as consisting of the big bourgeoisie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the petty bourgeoisie experiencing status-anxiety, and a portion of the mobilized working class. It then explains their structural preferenc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ideology, electoral base, and bourgeois interests.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the valor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r right's populism, sovereigntism, social conservatism, productivism, and meritocracy;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rai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lso makes it an ideal field for disseminating right-wing ideology, challenging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ng ownership of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issue. At the electoral level, the wealth polarization,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energy crisis since 2008 have led to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regions, with large numbers of workers and small business owners becoming potential supporters of the radical right; most of them rely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maintain their social status, so expand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hus serves a precise electoral mobilization function. At the level of bourgeois interests, facing persistently declining competitiveness, a portion of the bourgeoisie has grown increasingly dissatisfied with existing policies and establishment parties, turning to support the far right in order to expand labor supply, suppress wage costs, and use its ideology to divert workers' discontent; in Germany and France, the far right is striving to win the favor of the big bourgeoisie. In Switzerland and Hungary, the big bourgeoisie has already become a key pillar for the ruling party to maintain its rul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the demand-supply theory and issue ownership theory in party politics, combined with Marxist class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education policies of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Germany, France, Switzerland, and Hungary, explore the structural motivations behind their preferenc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mak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far-right vocational education class analysis demand-side and supply-side theory